

扎根本土 感应时代 守正创新

——写在《广西文学》创刊七十周年之际 □王 迅

位列新中国第一批文艺期刊方阵的《广西文学》于1951年6月创刊。作为老牌省级文学期刊，《广西文学》迄今已走过70个春秋。它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辉煌的巨变，承载着时代的记忆，同时肩负着培育文学新苗的职责，推出了不少优秀作家作品。《广西文学》不仅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创刊的省级文学期刊之一，也是文化大革命后期最早复刊的文学期刊之一。因此，相对于其他省级刊物，这本杂志以更长时段贯穿和衔接了当代文学70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广西文学》是作为重要标本镶嵌在共和国文学期刊版图中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微缩版，在当代文学研究尤其是文学桂军研究中极具史料价值。

现实主义主导下的多元文学出版生态

自1951年创刊以来，《广西文学》有7次更名：1951年6月到1956年12月刊名为《广西文艺》，1957年1月至1958年1月刊名为《漓江》，1958年3月到1960年6月刊名为《红河水》，1960年7月到同年12月刊名为《广西文学》，1961年1月到1966年6月，刊名改回《广西文艺》，1966年7月至1971年4月停刊，1971年5月复刊到同年12月刊名改为《革命文艺》，1972年1月至1978年6月刊名再次恢复为《广西文艺》，直到1981年7月，刊名改回《广西文学》，沿用至今。

高扬时代精神，推动主旋律创作，是刊物践行现实主义办刊理念的主导方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遵循“通俗化”“群众化”“地方化”办刊方针，服务于当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建设，在国家和党的重大历史节点，编辑部策划纪念专栏或专号，组织作家主题创作，以专栏或专号的形式倡导深入基层的文学创作，同时，又不失时机地隆重推出庆祝党和国家重要历史节点的纪念专辑，汇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主流。进入新世纪后，《广西文学》编辑部策划了多期长篇报告文学专号。其中，三期长篇报告文学专号影响甚大。作家王布衣挖掘广西河池市宜州区合寨村作为中国村民自治策源地的重大题材，创作出《震撼世界的广西农民》，于2007年第4期专号刊登后，引起强烈反响。同时，2009年第12期推出了龙鸣、邓咏创作的《云水激荡·2008广西北部湾》，2012年第8期推出麦展德的《走进东巴凤》，受到全国报告文学界瞩目。敏感于时代政策走向，及时策划报告文学专号，显示了《广西文学》聚焦时代进程的广阔视野和把握国家战略发展格局的高远目光。

新世纪以来，《广西文学》办刊的现实主义审美取向愈加凸显，刊登最多影响最大的都是关注

当下的现实主义之作。就拿2006年第5、6两期合刊的“广西小说新势力十一人展”专号来看，映川《为你而来》、李约热《巡逻记》、黄土路《年夜饭》、朱山坡《中国银行》、红日《说事》、锦璐《补丁》、梁志玲《突然四十》等都是反映转型期中国城乡社会弱势群体生存际遇的现实主义之作，读来不乏切肤之感。2014年，编辑部策划“特约头条”栏目，该栏目推出的小说大都透出现实主义文学的勃勃生气，邱华栋、林白、王祥夫、陈应松、雷平阳、鬼子、凡一平、田耳、李浩、张楚、胡学文、金仁顺、乔叶、武歆、付秀莹、黄咏梅、朱山坡、杨映川等作家都以现实主义力作在此亮相。他们的作品大多依循现实本身的纹理，在对生活暗角的探微中切人生活本质，直击痛点又不乏人文关怀。这类切近现实的作品，以现实主义冲击力形成声势，塑造着刊物的媒体形象。

关怀当下，直击人性的现实主义审美是《广西文学》办刊的主要价值诉求，但这并不是说，编辑对其他艺术风格的稿件就横加排斥。上世纪80年代，老编辑柯焯就鼓励作者从古典诗歌和民歌中汲取写作的养分，影响了一批诗人。当时还是《广西文学》编辑的诗人杨克联合作家梅帅元等提出“百越境界”的创作主张，成为中国寻根文学思潮的先声，对广西现代派诗歌的发展做了大量启蒙工作。尤其诗歌栏目，刊物并不排斥现代派诗人群体，而是大量采用了他们的诗稿，在编辑审美观念多元化影响下，《广西文学》形成了现实主义主导下的多元文学出版生态。

创造性的编辑策划突显办刊特色

优秀的文学期刊离不开优秀的编辑队伍和出彩的编辑策划。《广西文学》在栏目策划、活动开展等方面灵活多样，显示了编辑群体的学识、智慧与活力。

《广西文学》历来非常重视栏目策划，通过专题策划集中推介广西本土作家作品。1996年1月号推出“广西青年小说家八人作品展”，刊登上世纪90年代成长起来的新锐作家东西、鬼子、李冯、凡一平、常弼宇、黄佩华、沈东子、陈爱萍的小说。2006年第8期又不失时机地推出“广西小说新势力十一人作品展”。这是广西文坛积蓄十多年后形成的又一股冲击波。这批在当时看来还是广西文坛后起之秀的青年新锐，如今已成为“文学桂军”小说方阵主力军。2014年第5期推出了“广西‘80后’作家小说专号”，刊登了小昌、侯珏、吴了了、肖潇、车海朋、马中才、韦孟迪、钟欣等青年作家的小说，他们以叙述的自由感和视角的日常化彰显代际张力，呈现了青春期的自我寻找、生命



的躁动不安的状态，展露了广西作家队伍的后劲和潜力。三个专号在不同时间节点推出三代作家作品，展示了广西作家的整体实力与阵容，同时也促进了地方作家梯队结构的优化。

首先，发掘推介青年新锐，是《广西文学》办刊的重要支点。“新星座”“新秀看台”“新手出场”等就是专门为刚刚起步又不乏潜力的作者打造的栏目。纪尘、陶丽群、龙眼、周末、梁冰、林虹、陆辉艳、小昌、唐沁、侯珏、韦延才、费城、蓝敏妮、高力、安乔子、黄少崇、陈洪健、罗南、廖献红等大批青年作家都曾受惠于编辑着力于扶植“新人”的栏目策划意识。推介新人的栏目策划则是文学期刊的基础性工作，同样是《广西文学》实现出版价值的重要途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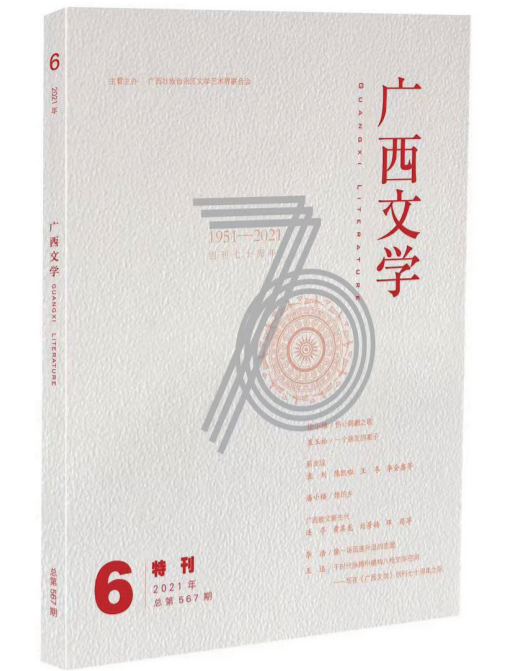
其次是出彩的专题栏目策划。作为《广西文学》十多年来打造的品牌栏目，“重返故乡”是针对当前文学现状以倡导更接地气的文学创作而开辟的特色栏目，组稿视野不断拓展，作者队伍不断壮大，足以成为地方性文学刊物栏目创新的典型案例。“名编访谈”基于文学期刊生态的观察，是《广西文学》副主编冯艳冰与当代名刊名编之间的对话，这不仅确保了访谈内容的专业性，显示了编辑家的学识与洞见，同时也提升了期刊的品位，体现了主持人开阔的胸襟与视野。2016年第1期开辟“散文新观察”栏目，面向全国散文

新锐约稿，并邀请散文评论家刘军担任特约主持。自开栏以来，该栏共推出60多位广西区内外交散文家的作品。开辟“广西散文看台”“特别关注”等栏目，对广西散文队伍作持续性地展示。

最后是文学活动的开展。杂志社举办创作笔会、改稿班等多种活动，培育广西本土作者队伍。自2006年起，刊物以专号形式推出“广西诗歌双年展”，以板块组稿方式绘制广西诗歌发展图谱。为了开阔诗歌创作视野，“双年展”组稿范围从区内逐渐向区外甚至国外扩展，促进了本土诗人和区外诗人的交流与对话。2020年第八届广西诗歌双年展暨新加坡南洋诗社、中国四川、安徽邀请展等，把广西区外诗人纳入双年展框架，开展跨省、跨国文学交流活动。以栏目策划带动文学活动，赋予了“双年展”更丰富的内涵与更广泛的关注度。同时，刊物每年举办年度奖，表彰年度最佳作家作品。评奖范围面向全国，影响越来越大。

在编创互动中助力“文学桂军”发展壮大

在广西文学繁荣发展的背后，《广西文学》编辑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广西当代知名作家，老一辈有林焕平、周钢鸣、武剑青、黄飞卿、莫之谈、莎红、贺祥麟、陈肖人、蓝汉东、韦一凡、包玉堂、柯天国、潘琦、蓝怀昌、周民震、孙步康、海代泉



等，第二代作家有东西、鬼子、李冯、石才夫、黄佩华、凡一平、黄神彪、潘大林等，更年轻的一批作家有李约热、锦璐、映川、朱山坡、陆辉艳、杨仕芳、红日、光盘等，他们的写作几乎都从这里出发。

壮族作家黄佩华回忆首次给《广西文学》投稿时说，得知短篇小说《拐角》拟被采用，心中“一阵惊喜”：“《广西文学》在这个节点拉的这一把，让我对未来陡增了信心，也一时摆脱了生活方面的困扰，暗暗继续发力投入文学创作之中。没过多久我又攻克了天津的《小说家》，还有《上海文学》《清明》和《当代》等刊物，为后来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广西文学》立足本土，竭力从基层发掘和培养文学人才，为作者的成长搭桥铺路，发挥了助力青年作者从广西出发走向中国文坛的桥梁作用。

为了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广西文学》编辑敏感于时代脉搏，致力于八桂文学空间的建构，同时，几代编辑同仁也不乏全国视野与担当。“百越境界”“88新反思”等基于广西文学现状的两次文艺思潮大辩论，都在《广西文学》留下了浓重的笔墨。在上世纪90年代商业主义大潮冲击下，文学期刊经受着市场化的考验，纷纷改版、改刊、停刊。1996年，《广西文学》敢于在文学期刊生存危机中发声，率先策划举办了“全国省级文学期刊生存与发展研讨会”，基于文学期刊生存现状研讨对策，引起中国作协领导的高度重视。这次研讨会的召开在《广西文学》办刊史上意义重大，充分展示了杂志社编辑同仁的情怀与担当。

创刊70年，《广西文学》始终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传承文脉，守正前行，硕果累累。新时代、新起点，祝福《广西文学》拥有更璀璨的未来！

(上接第2版)
青海6人
巨文毛(女,藏族)、杂德(嘎代才让,藏族)、李静(女,藏族)、贾文清(女)、董得红、蒋应梅(梅尔,女)
宁夏11人
马凤明(马凤鸣,回族)、田鑫、包作军、杨军民、吴全礼、洛进海(回族)、张鹏、董永红(女)、程耀东、鲁新华(鲁兴华,女)、雷忠(回族)
新疆23人
王国民(堆雪)、王信国、支禄、古丽加娜提·司马义(女,维吾尔族)、卡哈尔·尼亚孜(维吾尔族)、白合提亚·玉素甫(维吾尔族)、毕化文、吐尔洪·加拉力丁(维吾尔族)、合得尔汗·木哈太依(合得尔汗·木哈太,哈萨克族)、杨立新、杨志明、杨春(女)、阿子亚·马合别尔(女,哈萨克族)、阿勒玛古力·居玛江(女,哈萨克族)、宝音达(蒙古族)、哈吾斯力汗·哈斯木汗(哈萨克族)、祖力菲娅·阿不都热依木(女,维吾尔族)、党琦、铁来克·依布拉音(维吾尔族)、龚培德、银珉(玉松鼠)、曾丽萍(如风,女)、谢耀德
兵团1人
姜继先
延边4人
王汉琦、权春哲(朝鲜族)、全春梅(女,朝鲜族)、梁春植(朝鲜族)
军队7人
刘巍(蒙古族)、关冷(女)、陈飞琼(丫丫,女)、陈曦(女)、段连民、贾秀谈(女)、董夏青青(女)
石油1人
何喜东
铁路2人
黄华、程向阳
煤矿4人
刘勇、孙素平(女)、姚中华、薛广玲(女)
自然资源4人
任继红、吴文峰、汪洋(风子)、蒋宜茂
电力7人
王存华(女)、刘畅(女)、杨梅莹(女)、张一龙、陈彬(弱水,女)、崔宇、喻敏
冶金1人
何鸿(女)
水利1人
冷莹(女)
石化3人
严岛影、来卫东(东郭冰冰)、张海芹(女)
化工1人
崔宪生
公安6人
王向明、方培、张燕(至简,女)、贾卫国、管彦杰、薛景川
金融3人
于保月、祁海海、唐双宁(满族)
科普4人
王卫英(女)、刘洋、张军(小高鬼)、陈茜(女)
中央和国家机关9人
刘跃进(缓之)、许松林、杨平、何美(女)、佟鑫(女,锡伯族)、武丹丹(女)、苗伟、周立文、黄相宜(女,壮族)
香港3人
方思入(禾素,女,傣族)、邱婷婷(女)、罗旭(吟光,女)

短 评

边地英雄人格的尽情书写

——《北中国门》读后 □王 敏

王族的《北中国门》近日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书写边地英雄人格的纪实文学作品，作品聚焦新疆阿勒泰地区边防军人的日常生活，以白哈巴、扎玛纳斯、阿黑吐拜克、克孜乌雍克、北湾、吉木乃、达尔汗等七个边防连普通军人在守卫边防过程中经历的感人事迹作为小说创作的素材。这部长篇小说以发生在边防一线的真实事件为线索，反映出中国西北边关、边防连、边防军的现实生存图景与驻守边关的真实人生写照。值得一提的是，王族在新疆从军12年的军旅经历对他通过纪实笔法塑造边地边防军人的英雄人格具有莫大的影响力。正如王族在小说后记中所写的：“于是我决定，就写他们在遥远偏僻之地的事情——巡逻、潜伏、训练、驻守，甚至与牧民的交往，以及他们被环境改变，变得与牧民别无二致的相貌和生活习惯”，他认为这是一种在酷烈环境中为了实现组织任务所体现出的高度的服从力与极度罕见的自我约束，从这种自我约束中也可反映出他们对捍卫国家平安理想追求的一种个体升华与自我满足。

毋庸置疑，从文本实践的角度而言，《北中国门》对小说创作如何塑造新时代边地英雄人格具有一定的经验启发，而新疆边地无论是作为现实经验还是文本环境的背景，作为盛放英雄理想人格的地域环境，其环境的酷烈险峻往往又成为英雄们可以团结起来的前提。在小说中，边防军们从头至尾贯彻的都是军人捍卫国土边界、领土尊严与军人荣誉的“英雄主义”行为准则，这种行为准则的描述在呈现新时代边地环境中的英雄人格时具有如下三种书写特征。

首先，在边地环境中，英雄人格所具备的品质要求他

们往往需要为某些高于自我的价值牺牲自我，这种价值通常比追逐个人快乐或者生命更重要。如作者在叙述白哈巴边防连的故事时，记叙了苏志印等边防战士为保护当地牧民的羊群，如何克服对个人生命遭受威胁的担忧，与哈熊沟的狼和熊作战的事迹；在扎玛纳斯边防连，记叙了负责检查通信线路的军人贾连升在风雪中冻伤手指以致三级残疾的事迹；在阿黑吐拜克边防连，作者记叙了因执行任务导致腰伤的军人丁亚军转换岗位执意在团里的电台旁守电话，在妻子的陪伴下，坚守岗位，多年来不得休息，连连队后面的白沙湖都没有去过的感人事迹。

其次，在边地环境中，英雄人格往往拥有某种道德上的高度，这是其人格上的权威性与魅力性之所在。作为一种有魅力的人格，英雄通常会通过表现超出常人的能量、毅力、决心和勇气展示其人格魅力，给普通人以心灵的震撼乃至精神上的洗礼。如作者在克孜乌雍克边防连记叙了边防军人王平与李林在穿越沙漠的途中由于迷路导致缺水，不得不喝下自己的尿液以求顺利执行完任务的事迹，二人在体力透支不得不考虑生命安全之时，第一时间想到的竟然是在容易迷路的沙漠路口刻下“此为死路”的遗言，以免更多的旅人、官兵以及当地百姓因为在沙漠中迷路而失去生命的事迹，读后令人敬佩；在北湾边防连，作者记叙了被铺天盖地的蚊子叮咬后，仍然不慌不忙用手将国境线上40号界碑面向中国一侧上的蚊子抹去的执拗军人潘存文，其维护国格的行为如何令随军作家感动的细节，令人读来动容；再如，在吉木乃边防连，作者记叙了怀着满腔热

血赶赴距离吉木乃2000公里远的河北邯郸医院，冒充病危的卫生员李成一儿子的军人甘平，如何陪伴李成一度过人生最后时光的感人事迹，当被医生问及非亲非故为何要这么做时，甘平回答道：“他在吉木乃时是卫生员，救过许多得病的牧民。”这种高尚的道德自觉意识令人敬仰。

最后，在边地环境中，英雄人格通常具有超常的克制力，他有能力控制最难控制的自己，这种力量使得他愿意比一般人承担更多。记得刘劭在《人物志》中定义英雄时曾言：“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可见，英雄的本义就是植物和动物的精华，也如有些论者所言，意指人类从原始的自然状态中分离出来，同时又没有被社会权力异化的一种特殊状态。在边地环境中，英雄通常会借助于身体的自然能量、勇气、毅力和精神伟力控制自身进而能够抵抗外力的伤害，并同时保护身体能量较低的同伴，他们因此能够承担比一般人更多的责任。如在克孜乌雍克边防连，作者记叙了边防军人袁金平如何果敢地在第一时间跳进河水救起当地群众，这种行为与其未能提干间的叙述反差，恰恰凸显出大多数边防军人为了捍卫军人理想，不惜生命、无私奉献的精神壮举；再如在达尔汗边防连，作者记叙了为了改善战友饮水条件不得不在冬天远足背冰的军人杨军，在背冰途中被尖利的山石划破身体，仍然坚持赶在晚上9点，用沾满血的冰为战友们熬出了晚饭用的雪水的英雄行为，读来令人泪目。

从非虚构的角度而言，书写英雄的小说叙述语调大多需要展示而非告知，《北中国门》也不例外，这部作品整体的叙述风格冷静节制，对英雄事迹的陈述多采用对人物外部行为的展示，由此，英雄的生活在孤独的家园地理以及捍卫国土边界完整、边境主权威严的叙事中开展，这需要作者对此类题材不唯有驾轻就熟的采写记录能力，更需要有类同经验的切肤体认以及具有一定距离的叙述控制力。

身赤裸地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月光见证了少女的伤痕，也见证了她的羞耻。一个月后的某个夜晚，在月光将医院彻底照亮的时候，老姑娘和她的大女儿间隔两个小时离开了人世。那个16岁的女孩终究没能等来那辆承载着无限期待的遮羞布。

羞耻对于女性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赵丽兰敏锐地察觉到了，少女和妇女对于“羞”的体验是不同的，活人和将死之人对于尊严的体悟也是不同的。当我们把两个故事对照在一起读时，就更能发现女性体验的幽微与复杂。月光下，除了有老祖、奶奶、姑姑、妈妈的故事，也有“我”的故事。在《有人在月光下洗身子》《安放在月光里的床》《知羞草》等故事中，月光见证了“我”灵魂和肉身的成长。那些所有独属于女性的隐秘变化——初潮、出嫁、生育，都在月光的见证下发生。只有在月光下，“我”才敢拥抱、抚摸自己的身体，只有浩大的月光才能百无禁忌地接纳一个女孩对生命的期待与羞耻。

《月间事》中，所有的故事都在月光下发生或被讲述，正是因为故事的见证者和讲述人都是女性。只有女性能注意到那个被大火烧伤的少女对遮羞布的渴望，只有女性才能看到一张黄表纸和一个女人的身体产生的连接能够跨越生死和礼教。由此，月光下的历史与生命，就呈现出了与日光下不一样的质感，也更添了一丝凄魅与苍凉。

故事只在月光下

——评赵丽兰《月间事》 □霍安琪

是作为某种情思的寄托，也不是一片惨白的背景板，而是作为一种目光，去注视着生命的另一种呈现。那些由“我”的老祖、奶奶、奶奶、母亲讲述的故事，通通在月光下发生。例如那场发生于1942年的霍乱，也是由大姑妈在75年后一个残月高挂的冬夜里，为“我”娓娓道来的。在75年前那场瘟疫中，死去的大多是男人，而为他们抬棺送葬的人则是清一色的女性。这些女人在抬棺材时，都要光着屁股。原因是为了不让鬼羞死，以防染了瘟疫的鬼又来祸害人间。在人与鬼的对峙中，活人可以不必理会人间道德的裁量，但死去的鬼却会因此而蒙羞。

除了一场瘟疫，月光还见证了一场大火。《说谎的火》中，一场大火带走了老祖李晓外的女儿和外孙女——我老姑妈和她的大女儿。当时，她们并没有死在火场里，而是全身烧伤，被送到了医院，浑身赤裸地躺在冰冷的灯光下，就这样躺了一个月才死去。在这一个月里，大姑妈的女儿——这个16岁的少女，向所有去看望她的女性都曾讨要过一条短裤。即便她已经遍体鳞伤，但她无法忍受自己的肉